

经济史

论丛

(二)

Jingjishiluncong

缪坤和 主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F129/17

:2

2007

经济史论丛 (二)

主 编 缪坤和

副主编 何伟福 常明明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史论丛. 2/ 缪坤和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17 - 8130 - 0

I. 经… II. 缪… III. 经济史 - 中国 - 文集

IV. F 1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710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组稿编辑: 刘一玲

责任编辑: 霍宏涛

电 话: 010 - 68359417 13681590988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中子画艺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130 - 0/F · 7128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9359417 68319282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目 录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体系与方法论	杨华星 (1)
唐代土地产权变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曹端波 (15)
南诏、大理国的经济关系析论	缪坤和 李 维 (40)
南诏盐业经济研究	张丽剑 (69)
两宋都城节日商品市场	魏华仙 (76)
清代以来云南主要矿业城市的发展研究	
——以因锡矿、铜矿、盐矿开采而形成	
的城市为例	赵小平 (97)
简述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的发展	
过程及两次金融风潮	梁宏志 (111)
再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内部矛盾及	
其解决方式	
——对指导 20 世纪 50 年代农业集体化的	
一个理论的反思	苏少之 (182)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的	
历史考察	宋士云 (195)

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保护政策

演变的历史考察 张连辉 (219)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农村信用合作社

借贷活动的历史考察

——以鄂湘赣三省为中心 常明明 (251)

建国初期中国商业信用制度

的强制性变迁 赵学军 (268)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及激励

机制演变分析 武 力 (291)

编后记 (313)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体系与方法论

杨华星^①

—

“经济思想史有研究对象，总的来说，是研究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② “经济思想史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所有意见和愿望的总和，特别是在某一时间和场所浮现在公众心中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经济政策的意见和愿望。”^③ 经济思想是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表现，是生活在各个阶段的人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对当时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问题的看法或主张。人们的这些思想活动，也必然相应地创造出一些原理、观念与范畴。经济思想的主题是经济问题与经济关系，因此一个国家一段时期的经济状况与经济关系的特点，必然会通过相应时期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体现出来。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具有较为鲜明

① 作者简介：杨华星（1975 - ），男，四川剑阁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所副教授，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研究。

② 巫宝三：《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载《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的综合性质,涉及经济、历史、哲学等学科领域。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自梁启超1902年拟著一部《中国生计学小史》,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中国经济思想史至今经历了从草创到建立到初步繁荣这样三大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自1978年创立到现在,不过二十余年的历史。^①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在整个经济思想史学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就足以和中国文化遗产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相提并论”^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丰富的,与西方近代经济学虽然无法相比,但与欧洲古代中世纪相比,中国经济学则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并对欧洲的重农学派产生过一定影响。”^③

要理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必须先搞清楚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分期。有关这一问题,自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成立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学术界的代表性观点有三种,即二分法一种和三分法两种。二分法是早期研究经济思想史学者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分为先秦时期和秦至清时期,因为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理论性较强,可同西方意义上的经济思想相比较。秦以后,中国经济思想的实践性与功利性加强,因此该时段没有经济思想,只有经济政策。三分法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以胡寄窗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分为先秦、秦至唐代、

① 叶坦:《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断》,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赵靖:《学术开拓的主要路标》,第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第2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宋至清代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为领主制经济及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第二阶段是地主制经济上升时期的经济思想；第三个阶段是地主制经济趋于衰落时期的经济思想。这种观点把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的结合起来。^①另外一种以赵靖先生为代表，认为春秋末期以前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萌发阶段；春秋末期至西汉末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西汉末期至清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与衰落时期。^②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四分法。第一阶段是春秋末期以前，这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发生阶段，这时的经济思想较凌乱，没有什么体系，同时资料也较缺乏，只是就社会中的某几个问题展开了一定的论述。但它为后来经济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土壤。第二阶段是春秋末期至西汉末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百家争鸣，各申己见，但已经出现了思想上相互吸收的情况，这是后来经济思想正统化的前奏。第三个阶段是西汉末期至唐中叶，这个时期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形成与缓慢发展时期，其显著特点是经济思想的起伏与曲折，但也为后来经济思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第四阶段是唐中叶至清时期，这是传统社会经济思想的繁荣与衰落时期。唐宋社会的转型为经济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异彩纷呈；但盛极必衰，自宋代以后，传统经济思想也走向了衰落的道路，并自此出现了向近代经济思想的转化，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也就开始了。

①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二

任何一门学科著作的编写均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体系，而各种体系也是各具优缺点，只有在一定的场合才可以确定某种体系的适用性。最早对经济思想体系问题提出讨论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个时段针对经济思想史的体系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在分析其中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思想家的经济思想时，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货币或财政等经济的范畴加以论述。因为中国的经济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在编写它的发展史时应该有与它相适应的体系，而不能借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现成的经济理论与编写方法来套写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当然，这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种论调，我们现在早已突破这种观点。现在学术界对于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的写法争论很大。归纳起来，我们认为有四种经济思想史的写法在当今的学术界是比较流行的。

首先是以人物为经朝代为纬的写作体系。这是一种传统的写法。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以人物的思想和人物出生的年代以及历史发展为学习和研究的顺序，因此经济思想史的写作也遵循这样的模式。这种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是胡寄窗著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叶世昌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简史》、赵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古代部分）。胡寄窗先生认为：“编写思想史尤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总须以个别主要的历史人物、学派或一定

历史时期的思想为线索。”^① 这样编写思想史有很多好处：首先，它可能通过人物生活年代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思想的内在秩序；其次，它可以清晰地理出思想的章节，便于学习和记忆；再次，以人物为经，资料容易收集，教学和研究都很方便，学生也好理解，真正做到事半功倍；最后，讲课的人也很好讲，便于利用手边的经典与书籍。以思想发展的朝代为纬，思路清晰，把一切我们认为重要人物的思想一网打尽，这样就构成了传统上的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这些写法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表现在：一般人认为真实的思想就是这些精英与经典构成的，思想的精华进入社会，支配生活；思想的历史描述思想家构成的序列，后来人的思想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思想家的序列就是思想的发展历程。这种写法认为精英与经典的历史就是完整而真实的历史。

这些写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还是历史上的思想，抑或是历史上人物思想的历史？人物出生的年代是固定的，但思想的发展是起伏的，天才的思想并不是按年代顺序出现的；思想史的序列并不完全与历史意义的时间顺序相合，思想史上的天才，有的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或者在若干年后才会被重新发掘。精英与经典的知识超过常识，未必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所以经典与精英的思想未必是当时真实的思想历史。以人物为经的思想史，其实是历史史料上有记载的精英人物的思想，这并不是历史上经济思想的全部，还有不见于正史的下层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这是精英人物的思想在历史上的沉淀，是社会大众意识的根本之所在。记载精英人物思想的正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这不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

是全面的思想史。传统思想依据的是某种怀有官方意图或控制知识与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记述，他们的立场和使用的方法未必真实。思想家的选择与官方的选择是不完全相同的，官方的选择是经过过滤的。^①

其次是以中国社会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为体系。这是一种新的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的提倡者是清华大学的葛兆光。葛兆光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摆脱了以前思想史的教科书式的写法，不再以思想家为章目，而是探寻思想发展的轨迹，写出思想发展的历史。这正如葛著中所说：“翻开叫做‘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接踵排衙而来的，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累牍地出，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仍不够等级的话可以几个人合伙占上一节，再不济的话也可以占上一段，只要在那上面留下文字的就算‘永垂不朽’。……而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的照片。”^②的确，以往的思想史主要被写成了思想家思想的历史，这就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只有思想家才有思想？或者说只有思想家的思想才能算思想史写作的内容？下层社会有没有思想？如果他们思想的话，那么他们的思想如何被我们现代人所认识？这难道不是思想史家的责任吗？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工作者，最大责任在于告诉现代人，我们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

① 葛兆光对此有充分的论述，可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不是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历史研究应该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现实。

具体对于思想史而言，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于弄清楚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现在的种种思想传统、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心理都与传统思想有密切相关；而这种相关与我们通常研究的上层精英思想是有区别的，比如近代的义和团运动，它在多大程度上与上层思想有关？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正如葛著中所说，首先要在写法上进行变革，改变过去那种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线索的写法，真正以思想的发展为线索，还思想史本来面目。正如葛著中所言：“思想史中需要叙述和整理的不仅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而且也包括叙述和清理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无法用‘人’或‘书’的章节，也无法用某个短时段的章节来处理的；我所理解的思想史要叙述精英的思想，也不只属于思想家的天才，也不总是思想家的顿悟，在他们之前，在他们之后，在他们的知识背景中，在他们的气氛里，思想常常有来龙去脉……。”^① 我们的思想史，正是要搞清楚思想发展的一般脉络，以保证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而并不是给前人的某种思想记功过，对他们的思想予以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

再次是以思想发展逻辑为写作思想史的体系。正如吴松所说，“能否在史家们卓有成效的习惯做法之外，通过对某一极其重要的经济思想或问题的提炼、剖析和研究，辟出一条用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逻辑来穿引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问学途径呢？”^②。吴松在这一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6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吴松：《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第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牵头写作的《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无疑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杰出代表。这种写法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每一个专题有一个系统的了解。这种按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编写思想史的做法,无疑更符合思想发展的逻辑,把握了思想发展的真正脉络。我们认为思想史是思想发展的历史,而不应该向传统的思想史那样被写成历史上的思想。在各种专著以及综合性的著作中,把每个重要的思想史家的思想描述一遍,再加上几句评点,这就成了传统的思想史。经济思想的写作也不例外。当然,我们也认为写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写到这种思想的主体人物,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思想发展的历史,应该淡化人物思想的比重。因此,按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写思想史,更符合社会实际。

当然有的学者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因为这样写思想史“将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的全貌割裂开来。因此采用此种方法的历史著述只能命名为‘史论’,不能直接命名为什么史”^①。这种说法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它对于历史著述的理解可能过于严肃了。同时,胡寄窗认为这种写法只是著作者尚未充分掌握专业知识以前不得已采用的编写方法,笔者认为恰恰相反。这种写作方法是十分考验写作者专业知识的,因为写作思想史不能就某种思想而谈思想,每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也就是说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因此,要准确叙述这种思想,需要了解的内容很多,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思想史的写法可能需要更扎实的专业知识。有关经济思想史写法的讨论发展到今天,这种以思想发展为逻辑的写作成为一种重要的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

叙述方法。其中代表作则为吴松教授等的《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陶一桃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述评》。

最后是以各历史阶段历史人物为纲的经济范畴写作体系。这种写法是第一种写法与第三种写法的折衷。即在叙述一定时期的历史人物、学派的经济思想史时，加入各种经济范畴，如财富、生产、分配、货币。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的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的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发展的特色。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史，由于当时并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甚至专业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古代都不曾存在过，人们的经济思想和观点通常都是混杂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实用的经济政策之中，如果不将他们各自的经济观点按经济范畴加以表述，就难以与他们的哲学、政治、实际政策等观点严格区分开来。不以一定的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内容，就不足以体现出经济思想史的特点。因此，这种方式是经济思想史写作过程中的一种表述方式，也是其他的思想史范畴内需要采用的一种主要的写作方式，只不过是不同的学科自有其叙述的范畴而已。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离不开对个别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的研究。研究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主要是根据他的著作。这种研究方法有其方便之处：因为根据某人传世的著作，就可以写出有关他经济思想的论文，即使掌握史料不多的人也能下手进行研究，这样便使有些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产生轻视史料的倾向。实际上，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经济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取决于研究者掌握史料的程度。如果不注意掌握史料，仅凭历史人物的几本著作，是很难对研究对象的经济思想作正确分析

和评价的。经济思想史是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因此我们在分析每个人物的经济思想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思想是继承前人的,哪些思想是自己创建的,这些都只有在掌握了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之上才能作出结论。因此,各种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决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这方面杰出的代表是吴松教授的《叶适经济思想研究》。

其实,各种经济思想史的写法没有高下之分,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缺点,关键在于写作者对于史料的掌握、对经济理论的把握和史学素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史无定法。

三

当今是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的时代,历史学作为研究过去发生事情的学科,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冷门,史学危机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此,历史学科要发展,就必须在方法上和理论上创新,保持学科的生命力。“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学科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近年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①。当前的历史学科包括思想史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理论上的,也包括方法上的。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思想和学说与经济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制度和经济发展是如影之随形，直接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不停止在对概念、学说、政策的一般的和表面的理解上，而是深入到各个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阶级利害关系的分析上。”^①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时，应把经济事实作为经济思想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以揭示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社会内容；注意政治制度和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同经济思想的相互联系，研究这些因素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考察经济思想自身在发展中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了解已有的思想资料对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作用等等。

第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经济思想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历史是一种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则有自己的规律可循。因此，我们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寻找经济思想发展与演变的逻辑，才能把握经济思想史的全貌。重视历史实证是我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实证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础，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是靠历史实证就能解决得了的，还需要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结合，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时，要注意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

第三，史料和考据的方法。“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②季羨林也说：“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

^① 巫宝三：《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载《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年版。

^②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5~6页，载《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①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历代经济论文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前代的典章制度和前人的议论主张。不了解前代的有关历史就很难通读全文，更不要说作出正确客观的评价。要充分掌握史料则要多读相关的书籍。文章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内容，正确、恰当地引用史料，能为文章增色。首先，我们认为引用的史料要广泛。中国历代的史料十分丰富，宋代以后更甚。如果在著述中只引用常见史书中的史料，就会给人一种史料单薄的感觉，进而也会影响表达。事实上，单靠常见的史料也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年青一代对于史料的理解与把握比之老一代欠缺一些，引用史料的广泛与否反映了研究者的功力。同时我们也要在引用相同史料时尽量选择早出的史料。同一条史料出现于多种古书是常有的事情，引用史料则要研究其源流，尽量引用早出的或比较早出的。因为早出的史料可能更接近历史原貌，即使史料的内容完全相同，引用更早出的史料显示出作者严谨的学风。由于查找史料的困难，有的研究者以在他人著作中寻找史料为捷径。参考他人的著作当然可以，但找到有用的史料后一定要找原出处进行核实工作，直接以他人引用的史料为史料是十分危险的。无论哪一位专家，他的学问再好、治学再严谨，总难免有疏漏，有的是对史料的_{理解}有误，有的则是抄录史料时有笔误，有的是排印有错误，有的是引用史料本身有问题，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断章取义，这就必须要核对史料的原文，才不会以讹传讹。如果重新核对史料有困难，应标明转

① 季羨林：《我的学术总结》，载季羨林：《学海泛槎》，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吴承明先生也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见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